



# 国际科技合作通讯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主办

2006. 12

## 目 录

**陈竺再次当选国际科学院组织主席**

**学习借鉴外部经验 加强改进审计监察工作**

——管理与监督考察团访问新加坡、越南和香港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谈中美关系**

**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博士在我院做报告**

**马普学会乌里·施瓦茨教授逝世 路甬祥发唁电致哀**

**中德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出访挪威**

推进与俄罗斯乌克兰合作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考察公共事务管理制度 为科技发展提供支撑服务

美国科研活力常在的奥秘在哪里？

**围绕定位 主动为国际合作服务**

——中国科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2006 年工作回眸

**友好往来**

## 陈竺再次当选国际科学院组织主席



12月5日，在埃及亚历山大举行的国际科学院组织(IAP)大会上，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在 2003—2006 年任期期满后再次当选为国际科学院组织(IAP)双主席之一。

国际科学院组织成立于 1993 年，秘书处设在第三世界科学院总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其最高权力机构是执行委员会，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各推选的一名主席(双主席制)和 11 个 IAP 成员科学院的代表组成。新一届的执行委员会主席由陈竺和加拿大科学院的 Howard Alper 教授共同担任。(国际合作局)

## 学习借鉴外部经验 加强改进审计监察工作

——管理与监督考察团访问新加坡、越南和香港

为加强和改进我院内部审计、监察和财务管理等工作，12月3日至13日，应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越南科学技术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中纪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王庭大率我院管理与监督考察团访问了新加坡、越南和香港，重点

考察了有关科研单位内部管理监督、科技资源配置和效益审计方法，以及廉政和反腐败措施的情况。

期间，考察团访问了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新加坡管理大学、越南科学技术研究院、越南科技院地理研究所、越南科技院生态和生物资源研究所、越

南国立大学、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审计署、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



等单位，就审计的模式、职责、权限、内容、工作程序和科研单位财务管理，以及监察等情况，听取了有关人员的介绍。考察团还就开展绩效审计面临的难点问题，审计内容的确定、评价标准的制定、审计建议的落实、审计职能的发挥等与被访问单位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在越期间，我驻越大使馆胡乾文大使、翟雷鸣

参赞会见了考察团全体成员。考察团还专程访问了越共中检委和越共中组部组织科学研究院，就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翟雷鸣参赞陪同参加了会见。

此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新加坡严格的管理和规范的审计，越南的党内民主和反腐倡廉，香港的绩效审计和廉政建设都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香港期间，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副主任彭清华同志会见了考察团全体成员。通过学习借鉴国外境外先进的审计、监察和财务管理的经验，必将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院创新三期的审计监察和财务管理工作起到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国际合作局）

##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谈中美关系

12月14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并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以“新世纪的中美关系”为题发表演讲。演讲由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主持。

布什说，在21世纪，我希望各国领导人团结起来，展开各个方面的合作，建立国际新秩序，其中包括政治和贸易自由。他认为，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光是影响中国和美国，还会影响世界和平。中美双边关系将会对全世界造成很深远的影响。美国和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交往和联系。布什说，中国不会谋求霸权，中国没有侵略别国的历史。他坚信中国的发展会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尽管问题和挑战并存，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和美国之间会有很好的发展。他呼吁要抛开不同

政见，共同为人类的福祉谋利益。

谈到贸易逆差这一敏感问题。布什希望中美友谊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他建议，中美本着两国友谊，携手合作的原则，把贸易不均衡的原因找出来。他渴望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对中美贸易未来、前景充满着乐观。他强调，加深两国合作对解决贸易逆差、解决朝核问题、提高双边人民的生活质量、打击恐怖分子、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全世界的和平稳定等方面都有积极地推动作用。（研究生院）



## 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博士在我院做报告

12月14日，应我院邀请，1997年诺贝尔物理



奖得主、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朱棣文博士在国家科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Energy,

Climate and the Helios Project at LBNL》的报告。

他从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问题等方面讲述了美国国家实验室在面对当前国家和世界需求时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京区各研究所科研骨干和博士生近400人出席，报告会起强烈反响。陈竺副院长主持了报告会并向朱棣文博士颁发了“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证书及奖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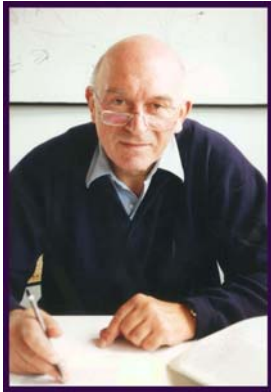
朱棣文博士是世界著名华裔物理学家，1997年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与其他

家科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Energy,

两位学者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8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4 年被任命为劳伦斯·伯

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朱棣文博士曾多次访问中国。(国际合作局)

## 马普学会乌里·施瓦茨教授逝世 路甬祥发唁电致哀



12 月 21 日, 中国科学界的老朋友, 马普学会著名科学家乌里·施瓦茨教授 (Uli Schwarz) 因病医治无效在德国去世, 享年 72 岁。

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院与德国马普学会开始学术交流以

来, 施瓦茨教授就致力于推动马普学会与我院的科学合作。30 多年来, 他为我院与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合作奠定了一个又一个坚实的里程碑。从发起创建马普客座实验室到首倡建立青年科学家小组, 再到动议建立并领衔上海交叉学科中心, 直至最后推动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的建立, 这一切都凝结着施瓦茨教授的心血。中德两国政府也给予施瓦茨教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德方称他是“德中科学合作花园园丁”, 而我国政府则授予他国际科技合作奖和友谊奖。

施瓦茨教授去世后, 路甬祥院长和陈竺副院长都向施瓦茨教授家人以及德国马普学会主席表达了我院以及个人的沉痛哀悼之情。路甬祥院长和陈竺副院长还亲自拟定唁电, 表达沉痛哀悼。路院长

致马普学会主席唁电全文如下:

尊敬的格鲁斯主席:

惊悉 Uli Schwarz 教授不幸逝世, 万分悲痛。他的逝世, 不仅是马普学会的重大损失, 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重大损失。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而且是一位伟大的仁爱者, 他挚爱他的祖国, 挚爱他的家庭, 他也挚爱着中国和中国人民, 挚爱德中两国的青年科学家。他无私地将自己的知识、爱心和全部生命奉献给了德中科技事业, 并将其视为人类科学文明事业的一部份。他的事迹感人至深, 他的业绩和精神永存, 将激励着我们将他至爱的科学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请接受我诚挚的哀悼, 并请转达我对 Schwarz 夫人以及家属亲友的深切慰问, 望节哀顺变。

中国科学院

路甬祥

2006 年 12 月 22 日

国际合作局葛明义副局长、上海生命科学院裴钢院长、甘荣兴副院长以及上海交叉学科中心副主任季维智等人将代表路院长、上海生科院以及交叉学科中心赴德国参加了施瓦茨教授葬礼。(国际合作局)

## 中德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中德学术讨论会—“中亚古生代和中生代地球动力学演化”于 2006 年 12 月 4 日—9 日在北京中德科学中心召开。该会议由中德科学中心资助, 国际岩石圈计划工作组 I 以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该会议。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肖文交研究员、德国 Mainz 大学 Alfred Kröner 教授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中德科学中心主任 Reinhard Rutz 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

《Episodes》主编杨振宇教授代表国际地质对比计

划中国委员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邀请在

《Episodes》发表相关的大会报道和学术成果。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翟明国研究员参加了研讨会活动并致词。国际科联岩石圈科学委员会执行局委员王清晨研究员介绍了国际岩石圈计划及其任务组申请过程的基本情况。

来自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古巴和中国等多个国家或地区 5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其中, 国际学者 16 人, 国内学者 40 余人。研讨会包括 4 天科学报告和讨论; 另外 1 天参观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大

学和北京大学的实验室，了解分析仪器，同时请与参会人员就具体计划畅所欲言并进行特别的讨论。会议既展示了大量野外地质学证据、岩石地球化学分析和高精度年代学数据，同时也交流了国际地质学界关于东亚地质研究的最新的学术思想。

与会科学家精彩的学术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报告会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科学家对中亚和东亚地质在了解地壳的形成和大陆演化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等方面，深入交流意见并

达成共识。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并将就上述问题继续深入讨论，积极推进中德双边以及多边合作，就帕米尔—昆仑—秦岭—大别—苏鲁造山带与中亚造山带演化等专题进行研究合作项目的申请与进一步合作。与会代表对本次会议的组织安排、交流效果表示满意，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 出访撷英

### 推进与俄罗斯乌克兰合作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 中国科学院访俄罗斯、乌克兰代表团

2006年9月，曹健林副院长一行6人对俄罗斯科学院的无线电工程与电子学研究所、谢苗诺夫化学物理研究所等4个研究所、2个俄罗斯科研生产联合体（均为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以及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巴顿电焊研究所、海洋水文物理研究所等4个研究所进行了考察，参观了俄、乌两国科研机构的科技研究活动和成果，并与两国科学家和科技管理官员就科研工作和科技合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通过对这些科研机构的考察，代表团对俄、乌两国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能力、科研工作现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如何更好地开展对俄、乌科技合作有了新的认识。

#### 一、俄罗斯、乌克兰科研活动的特点

俄罗斯科学院和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曾是前苏联科学技术研究的骨干力量，对前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次访问所参观的几个研究机构均具备很强的科技研究、发展实力，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在前苏联解体后其发展的现状却有着极大的差别。

从总体上看，这些前苏联的科研机构的科学、技术基础雄厚，科技队伍水平高且结构合理，科研活动组织严密且深入，在学术思想和技术发展路线上自主创新能力强，在一些重要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学派”，发展出了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些前苏联的科研机构也存在科研分工过于专业化，学科发展领域比较狭窄的问题；同时，由于长期的封闭发展，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较少，某些科研机构的研

究内容、方式过于传统，研究成果与国际市场的主流需求脱节。在前苏联解体后，这些科研机构均面临着科研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并且年轻科技人才外流严重，科技队伍老化，严重制约了其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

#### 1、科技创新能力特色突出

此次访问的俄、乌科研机构所具备的扎实科学、技术基础和已取得的科研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些科研机构均是由在前苏联，乃至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技术权威所创建，因此形成了特色突出的学术流派，以及十分严谨的科研作风。由于这些科研机构在创建时均有十分明确的学科方向和科研目标，所以在相关领域所开展的研究系统性强，基础研究工作严谨、深入、透彻。同时，这些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组织体系都十分严密，并且具备结构比较合理的包括学术带头人、研究人员、技术支撑人员和辅助人员构成的科研队伍。

扎实的科学和技术基础、严谨而系统的科研工作、特色鲜明的学术思想，以及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使得这些前苏联的科研机构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创造性地发展了大量基础性关键技术和技术系统。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巴顿电焊技术研究所所在焊接技术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为国际焊接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前苏联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基础理论方面功底扎实，在相关领域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上，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学术流派和科技创新能力。在技术系

统设计方面，前苏联科学家具有独特的系统设计思想，能够通过系统总体的优化设计，扬长避短，弥补在单项技术方面的缺欠。近年来，随着苏联的解体，俄、乌两国科学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流增加，通过吸收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学术思想，其创新能力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 2、研究工作相对封闭

在前苏联时期，由于长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加上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的科研任务分工，前苏联的科研机构都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学术流派，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相对薄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乌克兰政府都注意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性，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两国的科技工作者也有着强烈的意愿。但是，由于长期与国际主流领域学术界隔离，俄、乌两国科技工作者对国际最前沿科技发展了解十分不足，难以把握国际交流、合作的主动权。此外，由于僵化、保守的科技政策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科技投入尚未有大幅提高，俄、乌两国科研机构与国外的科技合作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

这种长期徘徊在日趋全球化的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主流之外的状况，使得部分俄罗斯、乌克兰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不了解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在一些新兴的高技术领域（例如：IT 技术、微电子技术等）发展严重滞后，所开展的一些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严重脱离市场需求。这种情况在此次访问的俄、乌两国科研机构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尤其以 RAS 的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海洋水文物理研究所最为突出。

## 3、科技投入严重不足

在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衰退，政府的科研投入大幅度缩减。近年来，尽管俄罗斯的经济有了比较快速的增长，但政府对科研机构的投入增长缓慢，加上物价涨幅较大，使得实际的科研投入仍然严重不足。目前，俄罗斯科研机构除了从政府得到科研经费外，也通过承接委托科研项目从市场获得科研经费。由于前苏联的科研机构的经费一直由计划经济的政府投入保障，在苏联解体后，这些科研机构的市场竞争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加上近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其国内加工制造业仍然十分薄弱，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并不十分强烈。因此前苏联的这些科研机构从市场上获得的科研经费也十分有限。此次访问的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所和两个科研生产联合体的经费情况基本相似，政府投

入和市场竞争经费两部分的比例大约为 1:1，加在一起约为年人均 1 万美元。

在乌克兰科研经费不足的状况更加严重。尽管在前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曾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的政治局势一直动荡不停，经济增长严重衰退，政府对科技的投入与 10 年前大致相同，国内产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低下。即使是巴顿电焊技术研究所这样的知名科研机构，其年人均科研经费也只不过 1 万多美元。而由于经费严重不足，海洋水文物理研究所的核心科研工作基本陷于停顿。

## 4、科研管理体制与机制保守

为了提高其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其科技实力，俄罗斯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科技法规、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但是，在已经走过了 15 年的市场经济道路后，俄罗斯的科研管理体制基本上仍在苏联计划经济的思维下运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前苏联的科研管理体制和机制已经严重不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要求。俄政府已经进行了多次科技体制的改革，但是收效甚微；在科研机构内部，相关的体制和机制改革进展缓慢，特别是在分配机制、激励机制方面，相关的制度和政策还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对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非常不利的。此外，在科研管理部门官僚主义问题仍十分突出，这对调动相关的积极性，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和效益有很大的影响，也会阻碍其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进程。

在乌克兰，由于目前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堪，政府所掌握的科技投入资源有限，也无暇顾及对科技发展的战略部署和规划，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所只能各自谋求自身的出路，进行一些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例如：巴顿电焊技术研究所进行了大幅度的人员分流、裁减，也开始投资组建一些高技术公司，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海洋水文物理研究所，已经有科技人员“下海”组建私营公司。这与我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所进行的科研体制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看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乌克兰的科研机构在内部的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方面可能会比俄罗斯进展快，但会存在一个比较混乱的阶段。

## 5、科研队伍老化

由于这些前苏联的科研机构在经费上短缺，在体制、机制上僵化、保守，加上很多科研工作与国际前沿和市场需求脱节，高素质的青年科技人员流

失严重。在此次访问过程中，与中方代表团交流的俄（乌）方科技和管理人员的年龄基本都在 50 岁以上。这种科研队伍老化的现象也会对俄、乌两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 二、 俄罗斯、乌克兰科技合作的现状

上世纪 90 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后，我国的科研机构、工业企业抓住时机，采取多种方式（包括：系统整体引进、关键技术产品引进、智力引进等），积极开展了与独联体国家的科技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我国对俄引进、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 1、 盲目引进和重复引进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国内对俄引进、合作的单位大幅增长，但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造成盲目引进和重复引进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单位对国内的技术发展不了解，或是出于与国内单位竞争的考虑，花钱从俄方引进落后的技术。有些单位利用在行业上的地位，在不具备对关键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的情况下，重复引进整套技术系统，而没有发展自主的创新能力。

### 2、对俄合作难度和成本加大

随着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其研究机构的经费状况有所好转，科研人员的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此外，近来俄罗斯的政治局势比较稳定，俄政府开始对科技发展给予关注，加强对国际合作和技术输出的控制。

此外，随着西方国家对俄技术封锁的逐渐减弱，俄方的一些特色技术和研究机构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的对象，一些西方国家已开始与俄方共建科技研发机构；俄方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也在积极融入国际学术界，并开始加入一系列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科技合作的渠道和范围不断扩大。这无疑将增加我国与俄方科技合作的成本。

俄、乌两国的科技管理部门在对华合作方面，存在重形式轻实质的问题。很多合作的意向、协议签订后，往往得不到实质的落实。

### 3、 技术合作渠道萎缩

我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对俄合作取得较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工作在科研一线的大批 50 年代留苏学者的贡献。这些留苏学者对俄罗斯的技术发展和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并且与俄方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俄双方学者能够顺畅地沟通，在合作中情感交流融洽，建立了大量畅通的中俄科技合作渠道。

目前，国内这批 50 年代的留苏学者逐渐离开科研工作一线，大批留学西方发达国家的年轻学者成为我国科研工作的骨干。这些年轻学者与俄方接触、交流的意愿和机会少，对俄方科技发展的了解不够全面、深入。同时，由于中俄双方在科技领域的沟通、交流减少，俄方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情况了解更少。这使得已有的中俄合作渠道在不断的萎缩，而新的渠道也难以增加。

## 三、 开展对俄、乌科技合作的建议

中国与俄、乌两国在科技发展的优势领域上存在着互补关系，在技术供给和需求上也能够较好地相互支持。因此，积极开展与俄、乌两国更广泛、更深入的科技合作，将对两国科技的创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 1、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我国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正在实行的各种灵活、有效的科技政策，是吸引俄、乌两国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充分发挥我国现行科技管理的体制和相关政策的吸引力，以吸引俄、乌两国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更主动地寻求与中国的科技合作。

在这方面需要在一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如：对来华工作的俄、乌科技人员采取更灵活的聘用和报酬方式（包括在某些情况下的股权奖励）、对其知识产权采取更有效的保证措施，对与俄、乌两国科研机构合作的项目给予政策和经济上的倾斜，对与俄、乌合作建立的研究机构给予一定的运行经费支持等。

### 2、 改变技术合作模式

要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对俄（乌）的技术合作，需要实现以下两方面的转变：

首先，要从单纯引进俄（乌）方成熟技术和技术系统为主，向合作开展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为主转变。其次，要实现单纯的技术输入向技术输入和输出结合转变。在一些我国具有一定优势的技术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电子技术等，开展对俄（乌）的技术输出合作，将能很好地推动合作向更全面、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此外，还要从引进俄（乌）科技人员个人智力为主，向以提高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全方位合作发展，加强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

由于当前乌克兰的政治局势、经济状况尚不稳定，其科技发展的走向也尚不明朗，因此在对乌合作方面，当前比较有效的方式是聘请乌方科技人员来华工作，或由中、乌双方的对口科研机构合作开

展研究。今后，随着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也可采取组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的方式，进一步推进中、乌的科技合作。

### 3、 加强沟通和交流

彼此之间全面、深入的相互了解，是顺利开展合作的基础。并且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都十分重视个人间的情感和友谊。因此，加强中国和俄、乌两国科技人员在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情感沟通，

对于进一步开拓科技合作的渠道，推进科技合作的开展十分必要。

目前，需要在中国和俄、乌两国之间，广泛建立针对特定科技领域、固定的学术交流渠道（如定期的双边或多边专业论坛），增加双方科技人员的互访，以增强对彼此科技发展状况和技术创新成果的了解，并在中国和俄、乌两国科技人员间建立深厚的个人友谊。

## 考察公共事务管理制度 为科技发展提供支撑服务

### 中国科学院公共事务管理访问澳大利亚代表团

2006年10月，中科院公共事务管理代表团一行8人，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科学院、澳大利亚科工组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新西兰林肯大学、新西兰土地和环境研究所，重点了解了这些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在公共事务方面的管理经验，听取了他们在人事工资制度、激励制度、研究所和科研人员个人评价制度、资源配置制度、后勤管理制度，以及研究所和大学国际化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情况。同时就这些方面双方进行了深入讨论，探索加强双方交流，提高科研管理效率的形式与方法，所访机构对与我院进一步合作表现出强烈的意愿，特别是在新西兰访问期间，新西兰林肯大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当场就将今后拟合作的项目一一罗列在展板上，表示不久将赴北京和我院相关部门就科研与人员交流与合作进行实质性磋商。

#### 一、考察体会

从访问的这几个澳新国立研究机构来看，不论是世界著名的综合性大学、综合性科研机构，还是体量较小的大学，他们的管理工作都有着共同的特点：战略清晰、定位明确、科研管理执行力强。可供借鉴之处有如下几点：

1. 澳新科研管理机构人事工资制度级别明确、奖罚分明：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科研管理机构工资采用职级制（与英美类似），包括职位内提升（GS-General Service）和基本工资提升（Step Increase），两者互动，相辅相成。前者分15级，后者分10档。职级（GS）是由员工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和时间决定的。基本工资提升依据年度的表现。一般而言，大学本科毕业后，可获得GS5至GS7级，硕士

毕业可获得9级，博士毕业可获得11级。从7级，一般直接跳到9级别，从9级，可以跳到11级。基本工资基本上是年年升的，如果表现正常，经过评议，工资每年可以提升一档，如表现卓越，可一年提升三档，如提升到5档，即可晋级。晋级后的工资不低于上职级的工资，如此有卓越表现者的工资几年后与工作一般人员的工资就会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一般来说，多数人的工资一年提升一档。除工资激励措施外，还有奖金（Awards）制度，但是奖金一般不高于工资的10%。

对于高级科研和管理人员而言，实施有超级别（Super Grade）制度。对科技人员采用的是科技服务体系（Science Technology Service），对高级管理人员采用主管服务体系（Executive Service）。

2. 澳新重视科研成果转化，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产业化。

澳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普遍重视技术转移和与产业界的合作工作，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对外合作和技术转移工作，并且有从事技术转移的专门部门，技术转移和合作项目的收入占大学和科研机构经费相当的比例，与产业界的合作是大学和科研机构科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科工组织（在澳大利亚的地位相当于我院的院部；另有澳大利亚科学院，相当于我院的学部）主要从事以应用科学与技术研究，有17个研究所，6500名员工，每年预算9.5亿澳元，其中6亿元来自政府，3.5亿元来自咨询、联合投资和知识产权交易等合作项目。专门从事技术转移的人员共有50多人，分布在总部和各个研究所，而且他们的个人收入比研究人员、高级管理人员都高。

昆士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在 20 年前就专门成立了具有投资能力的技术转移公司, 它的任务是将昆士兰大学的技术、知识和知识产权带向市场。该公司一方面为工业界、商界、政府提供前沿技术的投资机会, 整合并管理跨领域的技术队伍为国内外大工程服务, 组织各类专家提供咨询服务等, 另一方面也为大学的研究人员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成果产业化, 并为咨询和科研合同提供市场和法律服务等。每年转移项目约 40-50 个, 项目价值约 3000-4000 万澳元。现在, 给公司年收入近 4000 万澳元, 近 1700 万元返回大学, 加上其他来自于技术转移收入占学校经费的 10%, 大学主要经费来源是学费和政府的教育经费。

### 3. 科研管理责任明晰、成效显著:

经费来源: 澳大利亚的大学和国立机构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供。同时,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每年针对大学和国立机构, 都会设立相关的科研项目, 以供这些单位提出竞争, 但从理事会上争取经费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 由大学来资付工资, 从政府争取的经费主要用来科学研究, 以便于参与国内外的项目竞争。

如对澳大利亚新威尔士大学来说, 来自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经费, 主要用于支持大学博士培养和项目研究。政府只给人头费, 住宿费用以及其他用途的经费来自大学自助。以往由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 目前, 资金来自大家(发展学位的来自政府), 希望学生能把社会的钱在成为政策研究家之后, 回报于社会。学生可以通过贷款采用现在学习、将来付款的方式。

专利申请: 专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部门的技术创新水平和潜在的产业竞争能力。澳新两国的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 非常重视专利战略。

如新南威尔士大学非常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与企业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申请和实用的专利很多。学校有相关的激励机制用来鼓励教授与外界联系。比如, 如果资金匹配等。同时, 非常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 有一套相关政策, 用来约束教授和企业界的联系, 以防止被滥用。

而科工组织每年申请专利超过 3500 项; 它的论文引用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30%。而且, 目前已有 160 多家公司的技术源头来自科工组织。

### 4. 澳新科研机构的工会组织发挥推进民主管

理作用:

访问澳新期间, 在澳大利亚科工组织、新西兰林肯大学, 也了解了他们工会的组织状况以及工作机制。澳大利亚科工组织、新西兰林肯大学分别是当地地方总工会的基层工会组织。员工自愿加入工会。加入工会的员工大致占员工总数的一半。在问到工会组织促进实现团体核心目标、推进单位中心工作, 他们回答的很简要, 内容也简单。主要就员工报酬、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保障等向行政当局提出意见, 方式主要是协商、谈判。(我们要召开职代会, 推进职工民主管理, 征集合理化建议, 组织职工文体活动, 健身活动, 帮助困难职工送温暖, 调解人事争议等等, 内容相比要多的多) 关系激烈时会摆出势不两立的架势, 但是大多数情况都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最近科工组织的工会加薪提案在当地声势很大, 最终通过协商加薪提案被行政当局通过。工会组织的加薪每年都有计划, 逐年落实。当局应对工会, 一是协商, 二是撇开工会要求, 直接与员工沟通, 主动听取员工意见, 根据实际情况改进工作, 较少采用对面谈判的方式。行政当局辞退员工, 与工会沟通是必经程序, 但是辞退员工的现象比较少见, 有员工不胜任岗位要求的现象, 通常是及时提醒, 及时改进。要求不高的普通岗位, 人员很稳定, 同一岗位工作十年、二十年的现象比较普遍。资深员工对单位来讲, 是宝贵财富, 通过晋级, 加薪, 奖励公关费用等方式激励员工勤勉敬业。积极、和谐的用工机制之下岗位纠纷罕见。关于“回避”, 高层管理人员一般不加入工会组织, 以免得出现误会, 在实际工作上角色冲突, 处境尴尬。

### 5. 澳新科研机构后勤保障社会化

澳新科研机构及大学的物业管理社会化, 宿舍管理方面还有部分自管职能, 文秘信档方面也有严密制度, 有秘书专门负责, 效率很高, 秘书长有权解雇任何一名后勤服务人员, 说明秘书长在人事安排方面有很大权利。

## 二、工作建议

### 1. 稳定科研管理队伍, 保证规章制度的完整性与持续性

澳新科研机构的管理队伍分为长期雇用人员与项目聘用人员两类, 这一点与我院机关管理人员构成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澳新科研机构中的长期聘用人员队伍相当稳定, 一个职员在某一个特定的

岗位上工作时间长使工作效率提高，工作经验丰富，从而使本领域的规章制度成熟完善，有益于管理工作持续稳定发展。近年来，我院机关管理人员的聘用合同为两年，客观上形成一个岗位的工作刚刚熟悉就马上面临重新聘用的问题，从而造成人心不稳，规章制度不能完整地贯彻实施，所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管理队伍，保证规章制度的完整性与持续性是营造和谐的科研环境的必要条件。

2. 加强我院技术转移中心的目标管理，保证我院科研成果社会效益最大化。

澳新科研机构及大学都设有专门负责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部门，相当于科研成果推向市场的中介体。他们熟悉科研人员的成果，同时也熟悉市场需求。从 1997 年开始，澳政府还启动了合作研究中心计划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CRC)，现共有 50 多个 CRC 中心，每个中心 7 年一期，可申请 100 万澳元的资金，但必须有项目支持，结合澳洲其他机构、企业、大学等进行研究，7 年期结束之后可以继续申请下一个 7 年计划，继续申请资金的条件是有多少科技成果转移到了企业生产中去。

我院的技术转移中心应借鉴澳新的相关经验，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评估各中心科研成果产业化工作效率，强化目标管理，以各中心所创利润为评估主要条件，激励我院所有技术转移中心为我院创

新跨越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3. 完善科研项目后评估制度。

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等机构，在项目管理和项目后评估方面比较有完善的制度。为加强我院创新项目的后期管理，促进验收项目成果的进一步推广，使其真正为科学技术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贡献，建议建立并不断完善我院创新项目的后评估制度。主要针对那些已验收 3~5 年的院立知识创新项目，包括知识创新重大项目、知识创新重要方向项目。

### 4. 加强与澳新的国际合作。

中澳同在东半球，只有 2、3 个小时时差，双方地理、气候相似；澳大利亚整体对华友好，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真正把中国当作战略合作伙伴的一个。这次考察过程中澳洲人对中国的友善与诚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双方都面临同样的战略需求：水资源短缺（南澳墨里河流域）、能源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保持及可持续发展、以及采矿技术等。虽然澳科技实力不如美、加，但有上述互惠互利的合作优势，足以支持今后双方的深入合作。



## 美国科研活力常在的奥秘在哪里？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邱举良

2006 年 9 月，我有幸参加了由人事教育局组织为期 20 天的中国科学院赴美科技创新高级培训班，访问了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美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立卫生研究院、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等单位，重点考察了科研管理和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

赴美前，查阅了有关美国科研方面的资料，带着“美国科研活力常在的奥秘在哪里？”这个问题启程前往美国，在整个参观访问过程中十分注意把

获取的鲜活信息与原先了解的情况进行整合，并与我国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似乎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看法与建议。

### 一、研发投资的多元化有机组合

2004 年，美国的研发总投资为 2910 亿美元，占世界研发总投资的 37%，远远高于欧盟（25%）、日本（14%）、中国（10%）、德国（7%）、法国（5%）和英国（4%）。美国研发经费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工业界，二是联邦政府，两者共占全国研发总经费的 93-94%，其余则由非赢利机构起到拾遗补缺

的作用。

### 1、工业部门起着关键作用

工业部门是美国研发工作的第一大投资者和第一大执行者。经过最近 30 年的努力，工业部门赶上并超过了联邦政府的投资。2004 年，工业部门的研发投资占全国科研总投资的 63%，达 1810 亿美元。在工业部门执行的研发工作占全国的 68%（经费 1980 亿美元），参与研发工作的主要行业是医药（约 600 亿美元）、汽车（约 450 亿美元）、通信（约 230 亿美元）和信息（约 210 亿美元）。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业部门完成的研发工作量 90%是靠自身投资，其余 10%则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每年约 200 亿美元）。研发工作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宇航工业（飞机和导弹，拿到国防部研发资金的 63%），而制药工业的研发几乎完全依靠企业的自有资金，信息和电子领域的研发投入 83%也是靠企业的自有资金。此外，工业界还资助一些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但所占比例很小（不足总投入的 2%）。需要强调的是，*工业研发投资的 70%以上用于产品开发工作，这既是企业利益驱动使然，同时也是工业研发投资热情高涨的原因所在。*

### 2、联邦政府发挥战略作用

美国联邦政府 2004 年的研发预算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1270 亿美元（同比增 8.1%），其中：国防部 660 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 52%，同比增长 13%），几乎全部用于开发工作，只有 7%用于应用研究和 2%用于基础研究；国内安全部 10.44 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 0.8%，同比增长 56%）；民用研发经费 560 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 44%，同比增长 2.9%），其中将近 50%用于生命科学和健康领域（280 亿，占联邦预算的 22%），其余民用领域（290 亿美元，几乎没有增长，只维持在略高于通货膨胀的水平）。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投资完全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通过经费调控，把科研力量导向国家关注的重点优先研究领域，譬如最近几年的突出重点是反恐和公众健康。*

### 3、非赢利机构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除了工业界、联邦政府和大学（比重很小）的投资外，非赢利机构的贡献占全国研发投资的 2.2%，承担了研发总开支 3.3%的工作量，也是研发投资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二、大力支持高校的科研工作

美国高校自有资金投入科研的力度尽管很小（约占研发工作的 3%），但在美国科研体系中起着

重要作用，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也是人员流动和产生新思想的主要发动机。

### 1、政府资助在大学科研中起决定性作用

美国高校的研发开支（约 300 亿美元）70%由联邦政府提供，主要通过全国性科研项目招标而获得。以不变价格计算，自 1996 年以来年均增长 6.6%，高于同一时期联邦研发经费总预算的年均增长速度（3.3%）。除联邦政府资助外，大约 20%需要从其他方面获取，其中州政府和地方组织资助约占 7.5%，与企业的研究合同约占相同比例，剩下的属于其他来源。

需要强调的是：在所谓的 20%自筹经费中，也有国家和地方的公共资金（尤其是对于公立大学而言），也有企业或基金会的资助，甚至包括大学注册费和经费运作的收益。

### 2、政府资助的重点领域

联邦政府的资助主要来自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部，它们分别占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研发经费的 60%、15%和 9%。此外，国家宇航局（约 5%）、能源部（约 4%）和农业部（约 3%）也给予大学一定的资助。

在大学的研发开支中，基础研究占 69%，应用研究占 24%，开发工作占 7%。如果从领域来看，生命科学、工程科学和信息科学在基础研发中的比重近 25 年来不断增强。生命科学目前已占研发开支的 57%，工程科学占 15%。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大学研发经费中的比重在下降。至于物理科学，尽管联邦政府努力维持支持力度，但也出现下降趋势。

### 3、联邦政府的资助方式

美国联邦政府对高校的科研资助是通过各个联邦机构、特别是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上百个计划的全国性招标而发放的。2002 年，美国高校共获得 117517 个项目资助，其中：个体项目（学术团体的课题负责人）108516 个，合作协议项目 6817 个，合同研究项目 2581 个。

在联邦政府层面，每年都要动员数万名专家进行科研项目的招投标工作。个体资助一旦发放，联邦政府只是对项目进行事后评审，而科研和行政管理交由课题责任人全权负责。合作协议资助通常用于创建研究中心和购置比较昂贵的大型设备。合同研究资助（国防部、国家宇航局和能源部等部委的重要手段）不是通过招标而是以合同形式将研究经费拨给高校，然后对履行合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 4、联邦资助主要集中在公立大学

联邦政府对高等院校的研发资助中，公立院校约占三分之二（培养出 77-78% 的美国大学生），完成的研发量也接近这个比例。我们发现，大学研发经费的 96% 是拨给排名前 200 名的高校，其中的佼佼者每年获得联邦资助高达 5 亿美元。获得联邦资助最多的前 45 所高校有一半以上是公立大学，平均每年获得的资助 1.5 亿美元以上。

如果进一步分析，55% 的经费拨给了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纽约、马里兰、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依里诺、密西根和北加利福尼亚等 9 个州的研究机构。在获得资助最多的高校中，医学院校占重要的地位，其中前 13 名每年获得的资助超过 2 亿美元。

#### 5、高校吸引最优秀的年青科研人员

我们发现，虽然美国有数百间高等院校开展研发工作，但由于它们获得资助的项目是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员自发提出的，而且这些项目建议是在联邦层面经过同行评议确定的，所以高校很难有本机构自主的研发政策。

这些院校的调节杠杆是确定教学研究人员岗位的配比，吸引和选择最好的人员。由于这些岗位有相当部分是终身的（高等院校中 60% 以上的教学研究人员都签有无限期的工作合同），所以人员的选择尤为重要。事实上，1989 年至 1999 年教学研究人员的总数几乎没有增长（增 6%），相反，博士后的人数在同一时期增长了 61%。目前，55% 的理学和工程学博士后是外国人，这些博士后是由教学研究人员根据所掌握的资金自行聘用（80% 使用联邦资金）。他们的合同期限通常为 1-3 年。这些年青科研人员可以连续签订合同，最长的达 6-7 年（生命科学领域）。

#### 6、高校的技术转移活动

最近 20 年间，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发展是一场重大革命，确立了高校在经济领域的角色。这是 1980 年颁布《Bayh-Dole Act》法引出的结果，该法规定：大学和其他非赢利性研发机构使用联邦经费资助获得的发现和发明，知识产权归它们所有，这就大大激发了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技术转移的积极性。

根据最新统计数字，2002 年美国高等院校获得的专利数占美国专利总数（153000 件）的 2%，获得的专利许可转让费收入 9.83 亿美元，约占大学研发总经费（300-350 亿美元）的 3%。其中做得较

好的院校有：斯坦福大学当年的技术转移收入 4100 万美元（研发经费预算 6.6 亿美元），耶鲁大学 4000 万美元（研发经费 2.82 亿美元），哈佛大学 1200 万美元（年度总预算 20 亿美元）。

大学人士强调：大学从事技术转移的主要目的不是直接的财政收入，而是从大学的整个活动考虑，通过人员在科研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使两者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知识的转移。

### 三、思考与建议

从以上情况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科研的状况是全国上下高度重视研发工作，确保科技投入；研发各单元分工合作，动员国内外一切力量，形成产学研一条龙，从而不断产生出创新性成果。尽管我们一时无法完全揭开美国科研活力常在的奥秘，但如下五个特点至少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

#### 1、创新意识植根于全民族之中

我们在参观访问中清晰地感觉到，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具体到每个人，都一致认为美国应当始终保持世界第一，超前的技术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手段。因此，研发工作应当导致经济效益的理念已深入到美国政策的核心，在科研方向和科研投入问题上，每年都要组织广泛讨论和听证，然后由国会批准年度科研预算。

#### 2、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

研发工作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一件大事，认为基础研究是对未来的投资，是美国技术创新成果的源泉，是美国科技领先地位的基础。虽然美国基础研究资助已经实现多元化，但联邦政府始终是支持基础研究的主体，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政府还通过税收政策等手段，带动社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 3、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政府部门设立各种旨在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专业计划，如美国海军的“青年研究员计划”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的“总统青年研究奖”（由国会直接拨款）。政府还努力加强人才的继续教育，让科技人员在专门设立的“国家技术大学”轮流接受再教育。

在引进和留住人才方面，美国主要通过三种方法，将全世界几百万的优秀人才吸引到美国来：一是长期执行有效的移民政策，每年至少为吸收国外各类人才保留 14 万名入籍名额；二是灵活的 H-1B 签证计划；三是尽量创造出较之其他国家更加自由宽

松的学术环境，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加上各种学术大师云集，营造出吸引人的大环境。

#### 4、促进联邦实验室和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联邦实验室和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合作，开展“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计划”，在大学兴建了25个工程研究中心；国防部、国家航空航天局、能源部、农业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大学兴建与本身任务相适应的多学科“科学技术中心”。

#### 5、盘活全国和国际范围内的经费资源和人力资源。

如前所述，美国的科研经费主要由企业和联邦互为支撑和互为补充，这两大力量相互协调的支点是大学与之相关的机构。这一体系使资本和研究人員、工程师在两股力量之间自由流通、没有界线。这种流动在大学也是如此，导致与产业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有一半在毕业不到三年内就在企业找到了工作。

大学科研的方式也特别适应产业界的需求，因为它们从联邦政府（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获得的经费而开展的科研项目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博士和博士后人员（通常来自外国）的使用也非常灵活。

在仪器设备方面，整个学术界（无论是国立还是私人机构）都可以通过项目申请进入由最先进的大型实验室和昂贵的大型设备构成的资源网络，使得可预见的成果有可能尽快变成现实。

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并在科研经费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我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研发工作各单元之间由于现有体制和机制造成的无谓竞争和低水平重复，以及产学研脱节造成的自主创新能力低下等问题。为此，特提出以下三点不成熟的建议。

#### 1、积极促进国立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交流

合作。

国立科研机构应更多地考虑把实验室或研发中心建在大学校园内，这样便于师生就近从事科研实验，国立机构的研究人员则可以更加便利地承担大学的兼课工作，同时可以在更长的时段内考察和物色科研助手和科研后备人才。

从长远来看，国立科研机构应当逐渐将培养后续科研人才的使命转移到高等院校，把财力和精力集中在科研工作本身，通过前沿科研工作和完备的科研设施吸引全国范围内由高校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年青科研人才，避免自身培养造成的近亲繁殖风险。

#### 2、把大型科研装置建设成为真正的公共技术平台。

建立一支独立于大科学装置建设或依托单位的高效、精干和稳定的运行队伍，打破大科学装置实际存在的部门所有制（专用设备另当别论），实现大科学装置的高效运行与利用，更好地发挥大科学装置的技术优势和在科学研究交叉融合、优势互补、联合攻关中的重要平台作用，推动跨部门和跨学科的开放共享。

#### 3、大力加强科技界与产业界的合作，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

鉴于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企业大量投资研发工作、甚至不敢承担使用新技术、新工艺风险的状况，建议国立科研机构设立专门负责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的部门，实地了解具有潜在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及时帮助科技人员申请专利加以保护，并与产业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尽快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断提升我国自主创新的程度。



## 围绕定位 主动为国际合作服务

### ——中国科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2006年工作回眸

2006年，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进一步围绕为全院国际科技合作提供服务的定位，在院各单位和国际合作局的支持、指导下，不断开拓服务项目，扩大服务范围，努力提供优质、高效服务，重视与兄弟单位相互合作，主动做好外事服务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效，获得了院领导和科研人员的赞誉。

—

1、护照签证部是为全院因公出国人员提供办理出国手续服务的部门，也是中心最繁忙的部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合作交流日趋

频繁，我院出国人员的数量从八、九十年代年的每年 1000 多人次，增长到最近几年每年近万人次。2006 年护照签证部受理出国（境）团组 3250 批，比上年增长 5%；受理人次 5635 人次，比上年增长 0.7%；办理批件 5194 件，比上年增长 12%；办理确认件 237 批，比上年增长 15%。另外，单独报批香港项目 10 批，代办京外单位通过邮寄发来的出国手续 1528 件，其中办理护照签证 984 件，较 2005 年代办数字增加了 3%。代办京区护照签证 89 件，较上年增加了 30%。

2006 年，办理护照、签证的急件大量增加，仅自受理之日起距行期不足十天的就有 550 人次，较 2005 年的 489 人次增加了 28 人次。经过部内全体同志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预定目标，保障了院内出国人员的按时成行。护照签证部的工作是平凡的，但在这看似平凡的工作中，却包含着一定的政策性和极强的时效性，为使每一位出国人员都能按时成行，同志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护照签证部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同志们深切体会到，团结才能形成合力，只有形成合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能力，才能完成逐年加重的任务，这也是护照签证部多年来一贯的追求。

2、会议展览部成立以来与院内外有关单位一起组办了近百个国际会议，通过举办这些国际会议的工作实践，锻炼和造就了一支组织国际会议的专业队伍，业务水平日趋专业化、程序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2006 年会展部经过艰苦努力，圆满完成了所承接的国际会议工作，工作中认真负责，想合作单位所想，急合作单位所急，贯彻了“服务第一，代表第一，会议第一”的三原则，努力配合合作单位做好会议组织安排工作。主要承办了国际干旱会议，生物节水国际研讨会，玄武岩地质会议，植物组织培养国际研讨会，亚太男科学会议，语义与知识网络国际会议等，均取得了成功。

随着我国科技界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我院各研究所凭着自己的实力在国际科技界争取到愈来愈多的国际会议在中国召开，国际会议从争办、筹备到召开有一系列的事务性工作要做，为了让科学家们专心一意地把心放在科研和学术交流上，会展部主动多承担一些会务工作。通过我们细致和热情的工作，与合作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和称赞。

3、多年来，综合事业部为院属研究所的多边

或双边的涉外科学考察和在境外举办科技展览活动提供了全方位服务，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在培训方面，为了配合院有关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应用开发和科技管理，配合院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在国家外国专家局、院归口管理部门、各职能局和研究所的支持下，共组织了几十个团组赴国外进行培训、参加国际会议、参加博览会等。

在组织和实施这些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研究所和科研人员服务为宗旨，根据我院长远发展规划，选择急需的出国项目和出国人员，认真遴选国外接待单位，精心设计出访内容，作好出国前的集训，选派有责任心的人员担任团组领队并制订有效的管理办法，重视出访总结和效果跟踪。通过组织这些出国团组，积累了许多经验，提高了人员素质，与国外的许多接待单位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2006 年，综合事业部主要组织了赴国外科学考察培训项目，其中有赴俄罗斯进行东北亚（贝加尔湖）科学考察，赴西藏和尼泊尔进行喜马拉雅山南北坡考察，赴欧洲进行科技园区科学考察，赴俄罗斯进行政务考察。组织我院离退休干部团赴美国进行老龄事业考察。协助组织接待了俄罗斯科学院来访人员等。

此外，继续加强与国家外专局的联系，获得了外专局颁布的组团资格认证。尝试与有关单位进行可行性业务联系和沟通，共同探讨进行合作的可能，积累了一些经验。

4、财务部的工作除了承担中心内部的财务工作以外，还为院属各单位的外事工作提供财务方面的服务。为出国人员和接待外宾的资金周转以及接受境外资助和捐赠等工作提供了方便。为京外的院属各单位提供在京购买机票、兑换外汇、办理护照签证等外事活动的人民币周转服务。为院属各单位提供外汇暂存服务和在举办国际会议等大型活动时提供刷卡收款服务。

## 二

回顾 2006 年工作，其中还存在作风不够严谨，主动进取精神不够的问题。2007 年要在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1、主动服务，及时了解我院各有关单位的外事所需，掌握所里工作动态，集思广益，收集信息。提高各种应变能力，主动抓住各种机会，走出去、请进来，为科研人员提供更为周到的服务。与院属各单位建立互利互惠与多赢共赢的合作机制。

2、广开渠道，与我院有关科研单位，特别是

科研团体、协会、学会等部门联系与沟通，选择配合我院知识创新工程中的国际合作培训与考察项目，寻找适应目前形势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开拓一些中心作为国际合作局外事工作的延伸的项目。

3、改进服务态度，进一步提高优质服务意识，

重点体现在热情服务、礼貌服务上。

4. 加强管理，增强责任心教育，提高现有服务质量，改进现有工作方法，提高员工素质，提高工作技能。使每个人在真正意义上理解工作的重要性，做到自觉工作，娴熟工作。

## 友好往来

2006年12月1日，路甬祥院长会见了世界轮椅基金会主席 Kenneth E. Behring 一行。路甬祥向客人介绍了中科院的基本情况以及中科院实施科技助残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并表达了中科院同世界轮椅基金会



进行合作来帮助残疾人的意愿，并指出，中科院可在提高西部贫困地区水质来减少残疾以及生产人工耳蜗等方面与 Behring 先生合作共同支持中国的残疾人事业。Behring 先生表示，目前基金会已在中国捐赠了 5 万多台轮椅，今后将继续捐赠并会寻找更多的机会帮助中国的残疾人。

2006年12月27日，施尔畏副院长会见了日本文部科学省审议官林幸秀先生等一行。双方对连续三年共同举办的中日科技政策研讨会所取得的有益成果表示满意，并商定明年将在日本举办第四届中日科技政策研讨会的主题等事宜。

